



《丁宝桢》  
施永庆 著  
济南出版社



《外面天气怎么样》  
蒋在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田守勇

在晚清政坛中，丁宝桢或许不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重臣那样耀眼，但他能在“同光中兴”中占据一席之地，自有其独特之处。清末民初著名政治人物陈夔龙曾评价丁宝桢“抚东督川垂二十年，卓然为中兴名臣”，并感慨其诗文“格律之谨严，训词之深厚，世之专力词章家者，或未能逮也”。这番话恰恰精准点出了丁宝桢身上的一个根本特质：其立身之本和为政之道，不是汲汲营营、权术机巧的产物，而是一种根植于深厚人文修养、人格力量和精神境界的外化。

清廷面临着列强环伺、内乱频仍、吏治腐败等种种积弊沉疴。在这种困境中，时代呼唤既清醒看到危机，又能果决应对的实干家。丁宝桢虽以文出任，却凭借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以其醇厚的文人本色和家国情怀，从弥漫着贪墨自肥、明哲保身的晚清政治乱局中脱颖而出。他在湖南、山东、四川等地任职二十余年，始终固守和坚持着孤勇者的气节与风骨，把自己的品格追求锚定在经世济民的宏大坐标上，从而呈现出一种超越时代、超越同侪的进取气质。

作家施永庆笔下的丁宝桢，坚守“自主建厂，自力制造”“不用洋员，自我发展”的自强自立信念，以洋务改革的先行者立于时代潮流的浪尖上；他坚守“法不可废，道不可屈”，在同僚的冷漠旁观下，挺身而出，不畏强权，以铁腕诛斩安德海，这既是对慈禧专权的直接反对，更是对“同光中兴”的行动支持；他坚守“亲民爱民”的民本理念，把爱民养民当作“第一要事”，疏浚黄河治水患，改革盐政解民忧，后人在他主持修建的黄河大堤上发掘出的纪念碑，“民不能忘”四个字，正是民心最朴素、最永恒的表达；他坚守“不可妄取民间一钱”的清贫本色，清廉自守，一尘不染，身为封疆大吏，却不入不敷出，生活拮据，甚至经常靠当铺典押救急，因此李鸿章称他“两袖清风，一无所有”，时人赞其“清风亮

节，冠绝一时”。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丁宝桢的坚守，有着温暖的生活底色。他内心最温柔的夫妻情、父之爱，都在他对妻子的无限思念、对儿子的书信叮嘱、送女儿远嫁扬州的细节刻画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丁宝桢》塑造了一位能臣的形象，即使处于时代漩涡中依然能恪守本心，以超前的视野和格局、坚定的信念和行动，为阴霾浓重的时局注入了一束穿透黑暗的光。

施永庆的写作一直离不开对历史和文化的独立思考，并善于发现其中值得书写的课题和焦点。这些年他笔耕不辍，创作题材涉及各个领域，诗歌、散文、小说、剧本等，特别是在地域文化研究和思考上取得了可喜成绩，先后创作了纪实文学《决胜莱芜》，散文集《伴着那泉水清音》《人在济南：众泉为我洗尘埃》等。2019年6月，他着手收集丁宝桢相关资料，至今方始成书。《丁宝桢》立足于宏大深厚的历史背景，聚焦丁宝桢在山东的十三年经历，在思潮迭起、思想对立、观点碰撞中思索和解读这位历史人物；同时又聚焦济南这个特定区域、在山东任职这段特定历史时段和济南名士这个特定群体，全面审视考量丁宝桢的生平经历和重要人生节点，从而把丁宝桢定位为“一位以实干政绩重新塑造济南城市品格的先驱”，并展示了其“清正廉明、勇于任事、务实干练”的品格追求。

施永庆把熟稔于心的山东历史人物和济南风景名胜，自然穿插在作品中，就像珍珠泉池里摇摇晃晃飘上来的小水泡，玲珑可喜。王薪传、王景禧、孙葆田、焦云龙、李瀛瑞、马国翰等，临摹刻画，生动形象；山东巡抚大院、尚志书院、文庙等，追溯渊源，宛在眼前；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珍珠泉、黑虎泉、佛慧山、燕子山，三言两语，勾勒精致，恰到好处。读《丁宝桢》的过程中，恍然间竟然感觉是在与丁宝桢促膝长谈、吐露心扉。或许这是一种跨越百年的精神共鸣和心灵呼应。

蒋在

《外面天气怎么样》收录了八篇小说，女主人公来自不同的城市，住在北京不同的角落，处于人生不同的阶段。我写她们的时候，也写我自己，我的母亲、我认识的朋友，甚至是那些我未曾谋面，却在电视或者新闻里出现过的女人。我们都在极力用自己的方式去经历、忍受、辩解、盼望，还有重新获取确认。

归根到底，我想写的是时间如何在这些女人的身体里流动、腐蚀和沉淀。我希望在女性的身体、疾病、老去、失语等等这些经验之中，找到一种平衡的方式：那就是或许不应该去讲述，而是去陪伴；不是试图去解释，而是去承认它的复杂与沉重。

《外面天气怎么样》里所包含的八篇小说，形成了某种奇异的对称关系，大部分甚至可以对阅读。

《初雪》和《11号病房》都在写女儿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初雪》里刚被裁员的穆小小，突然接到了父亲的死讯，她在无法原谅与血浓于水之间，反复地撕裂与缝合。《11号病房》里的何瑾秋和她母亲病态地相依为命，彼此为镜。这两篇小说皆是在写无法选择的血缘纠葛、挣扎与对抗。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漂泊的路上寻找着方向。

《失忆蝴蝶》和《呼吸》是两位婚姻中的女性。《失忆蝴蝶》中，她挣扎在无爱的婚姻里，被挤压、感到窒息、彷徨、不知所终。《呼吸》里的她在精神与肉身的暴力中，渐渐迷失了自己。这种类似“流放”的畸形压榨与谅解，形成的小说空间，如同枷锁一样充满了坚固的锈迹。时间和数字串联成一个谜团，死亡如同抛物线那样连接小说的终端与开始。

《爱不逢人》和《回声》是关于两个困在爱中的未婚女人。《回声》里的那个爱而不得的女人，在家里听到一次又一次，将她拒之门外的回声。而《爱不逢人》里，所有女性角色的名字都与草有关。这里面的每一个女人，虽然都在经历各自的苦痛艰难，她们却有着草一样顽强的生命，让我无数次想到，地砖缝隙里长出来的野草蓬勃而孤立。

《外面天气怎么样》主角是一个刚来北京、满怀憧憬、与人合租的年轻女孩。而最后一篇小说《许多》中，一个女人漂泊多年后，决定离开北京，回到故乡。一个讲述抵达，另一个讲述离开。

《许多》试图追寻命运重叠的轨迹，女主人公阿芳已然超越性地融进了之前的时间，与那块土地在不知不觉中相融相济。她家废弃的老宅，因为她的重新到来变得生机盎然，自然生命的映照给了阿芳丰沛的内涵支撑。这既是一种命运的妥协，也是一种对抗。在这个沸腾的世界里，阿芳重返自己一直对抗的故乡。但它厘清了与这个喧嚣世界背离的本源，重返何尝

不是生命的另一处路径。

小说里大部分女人经历的瞬间常常被忽略，或者被认为不值得深究，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存在的证明。故事中的角色似乎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做出什么重大的选择，她们的生活在重复与惯性中流动。可就在这种流动中，一些小小的瞬间闪烁着无法忽视的光芒，而这改变了她们的一生。

我曾与人就此发生过一段“争执”。有人告诉我看完威廉·特雷弗的小说后，“世上没有任何一个瞬间——尤其是我们当下正经历的时刻——重要到足以改变我们的人生”。我当时固执笃定地告诉他，一定有这样的时刻。现在，我依然坚信着有这样的时刻。

就像我小说里写的那样，它们往往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瞬间，或是一个对未来的简单展望，甚至是某种在当下发生的小小偏离。但正是这些时刻，决定了我们的生活。

我总试图向自己阐释写作的意义。罗兰·巴特曾提到一个场景，让他感动万分：“在摩洛哥，某日我独自驾车沿着干线旁边的小道，朝本苏莱曼方向缓缓驶去，看见了一个坐在旧墙上的孩子——这表明春天来了。”

多么迷人的描述啊，这个场景几乎在这样的虚无中否定着虚无，一个刚刚萌生的生命紧紧地贴着另一个生命，我们作为旁观者即将目睹时间永恒的循环。如今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有一个孩童正坐在高处，他汗津津的后背正紧贴着砖墙，他面前的小道充斥着伙伴们的呼喊以及汽车的喧嚣，不远处后厨的烟囱冒着腾腾的热气，两个工人架着梯子，柏油马路上回荡着梯子两端划过路面时尖利的声音。

纳博科夫写道：“加宁一把推开窗子，把自己连脚带人安顿在了窗台上。丝绒拉绳微微晃动着，白杨树间黑黢黢的星空让人想深深地长叹一声。那一刻，他郁郁地坐在厕所的窗台上，想着他也许永远永远都不会认识在纤柔的脖子后面扎黑色蝴蝶结的那个姑娘，他徒劳地等待着夜莺像费特诗中所写的那样在白杨枝头鸣叫——现在加宁认为，在他整个生命中那是最重要，最崇高的一刻。”（《玛丽》）

我们苦苦寻找的崇高难道不是人生中那一次次出乎意料，却改变我们一生的小小偏离？难道不是那个坐在砖墙上陌生且遥远的孩子？难道不是那个久久回荡在费特诗中，后又在加宁心中彻响的那只夜莺？水波推动着竹筏，写作让我们得以完成这样一次次的寻找：写作使我们获得形而上的一种幸福与安慰。在这个世界里，不可能的将化为可能，缺憾得以补全，不宽恕的得以忘却，失去的得以被寻回。在这里我们获得了完整的幸福。我们在艺术中将获得一种清凉的，潮湿的，荫蔽且芬芳的生命，获得另一种存在的方式：因为写作，我们未来确信会被爱。

### 被遗忘的瞬间

### 丁宝桢：在自立自强中突破困境

闲读随笔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 善待地球 低碳生活 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